

新知

上海辞书出版社

NO.2



王蒙 / 诗

谢春彦 / 画

山居杂咏·草木

浮沉皆一笑，

明月落山中。

世界观奇妙，

人杰逞伟雄。

尘云或蔽日，

草木难通灵。

此夜逢狐鬼？

嗟嗟羨蒲翁。

山居处草木深深。

友人笑曰：「此聊斋

故事之环境也。」

蒲翁谓蒲松龄。





目 录

第 二 辑

录
地
施

全 球 化

张颐武	全球化的文化挑战	2
桑玉成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原则	11
李宏图	世界体系视野下的民族主义	16
王玲一	经济全球化及其推进机构	20
郭隆隆	伙伴关系——面向 21 世纪的外交新模式	28
资料	“关贸总协定”的来龙去脉 (25) 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 (25) 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程 (26) 大财团、大公司合并情况选载 (27)	

王兴国	“实事求是”命题的历史演变	35
周振鹤	“澳门”与“Macao”得名缘由	44

周 宪	关于关键词“现代性”	56
洪 涛	文化在当代西方世界的没落——从北约空袭南斯拉夫谈起	64

陈思和	新生代作家——90 年代文学反思录 (一)	69
齐红伟	在“世界性”和“现代性”中对话的杜拉与张爱玲 (上)	74
陆 炜	法郎士的悲哀	84

黄建新、冯 涛 回归电影本体 ····· 88



茅正梅、李葆明（编译） 人脑与教育 ····· 94

李伟建 中国需要加油——中东石油与中国跨世纪能源安全 ····· 101

陈养正 “厄尔尼诺”与“拉尼娜” ····· 107

高永伟 “因特网”简历 ····· 109

■ 文 译

尹文子 哲人其萎矣——读《“松堂自序”》 ····· 111

刘佳林 蝴蝶·洛丽塔·纳博科夫 ····· 116

■ 时 尚

杨全强 机器复制时代的美女 ····· 119

■ 补 白

梅 进 走近“赛先生”(63) 陆海龙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插图本)出版(83)

李伟国 缘起 ····· 124

王 蒙、谢春彦 山居杂咏·草木 ····· 封二

崔 任 无题 ····· 封二

《辞海新知》编辑部

主 编 李伟国

编 辑 吴雅仙 赵荔红

· 乔 尹 冯 涛 ·

《辞海新知》第二辑

责任编辑 吴雅仙

版面设计：姜 明 明 婕

封面设计：姜 明

出 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 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地 址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 话：021 - 62472088

传 真：021 - 62894365

电子信箱 cishu@online.sh.cn

印 刷：上海市印刷七厂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26-0597-3 \ X 4

定 价：6.80元

编者按

“全球化”，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天涯若比邻”也已不再是人类浪漫的梦想。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500多个正在太空遨游的人造地球卫星用无线电信号拥抱着地球；正以每月200万新用户的速度扩大的国际互联网使相隔万里的人们得以瞬息间“面对面”坐在一起自由畅谈；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把世界融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然而，在如此眩目的“景色”中，我们依然经常能嗅到浓浓的硝烟，感受到人类各种不安的情绪。全球化真的是我们寻求世界大一统的一帖灵药吗？还是各国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呢？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已然无所谓“国界”的世界？如何适应犹如庞大的加速器的高科技时代？又该如何理解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强烈的国家主权意识和民族意识？今特邀学者、专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试作探讨，希望能给读者以启示。

京
海
世
地

全球化

全球化

的文化挑战

..... 张颐武

一

全球化对于我们的文化意味着什么？

我想从两个本文开始探讨。一个是上海女作家殷惠芬的小说《古庆里》，另一个是冯小刚的1999年贺岁电影《不见不散》。这两个本文显示了全球化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深刻的改变，喻示全球化已经是我们无可摆脱的命运。

“小雨从此和HART成了网上密友。他们总是在北京时间零点的时候在网上见面，小雨隔着茫茫重洋和HART说了很多心里话，她需要一个心灵的朋友。跨越空间的友谊弥补了她失去任言的虚空。有时候他们也会相约一起去参加某个网友的网上婚礼，或者在网上共同看一部最新的好莱坞电影，关于它的所有资料，比如某个演员的私人档案。有时候他们还忙着给对方传送自己最新的发现和最有趣的网址。她后来就十分理解那些通过某种信息、通过一篇新闻报道、一条征婚启事而产生心灵撞击彼此相爱的人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和HART会发展任何网下的关系。网友就是网友，它是真

实而虚幻的、任何显示的关系所无法替代的。”

这是《吉庆里》中的片段。在这里，网络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经验，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弄堂和网络中的生活毫无逻辑地拼贴在了一起。这个名为“吉庆里”的弄堂无疑已经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它通过小雨和HART的虚拟关系与美国几乎拥有共同的时空。殷惠芬提供了有关全球化冲击的最为感性和最为明确的表达。它喻示我们，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时髦话题，而且是我们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经验。

另一个例子是冯小刚的《不见不散》。这部1999年元旦期间在北京流行的“贺岁片”的背景在洛杉矶。但这里突出的并不是异国的奇观，而是一对中国青年的感情经历。这里已经没有1992年《北京人在纽约》播映时那种年轻人对美国无限的焦虑和无法把握之感了，在这部《不见不散》中，洛杉矶如同北京、上海、广州一样，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城市，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一切都非常平淡，它并不引起如《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奇观”效应。《不见不散》没有《北京人在纽约》的强烈的认同危机，其中那对中国青年的悲欢离合仅仅是感情的波澜，而不是面对美国时的不知所措。王起明的个人奋斗包含被美国的丰裕生活所赋予的象征含义，而在刘元的身上，我们仅仅看到了作为普通的日常经验的“移民”生活。《不见不散》显示了中国大众文化对于美国的看法已经不再如同几年前那样神秘。全球化的剧烈冲击使得中国对于美国的理解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化。美国在此被“解除神秘”了，空间的移动带来的文化震撼已经远远没有往日那样的强烈和紧张了。这可以说是阿卜杜拉的“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最佳例证。全球化使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有了根本的改变。

这两个例子说明“全球化”既是一种新知识的表征，也是我们的文化经验本身。这种经验传达的是信息和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状态”。我们无论在网上阅读斯塔塔尔的报告，还是观看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或者关心人民币的稳定，都与全球化有着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信息的无限流通使得人们在文化方面的选择日益全

二

球化，另一方面，资本的无限流通则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使得经济活动完全被全球化了。在这里，赛曼·杜林的表述非常准确：“与其说，金钱、传送和信息流是文化的基础，不如说它们是文化的媒介。因此，文化和经济及带有经济倾向的政治利益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清晰。”（《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但是在这样的“状态”面前，我们似乎尚未作好准备，在殷惠芬和冯小刚的想像已经到达之处，理论却失去了把握能力。我们发现中国文化研究在这一方面的深刻的困惑。这种困惑实际上是90年代以来我们面对的“阐释中国”的焦虑的延续和发展。

我们往往习惯于将全球化看成一个时髦的但和我们相距颇远的话题。一方面它被浪漫化了，成了解决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的终极幻想，在汉语语境中，有些人不断地用“世界潮流”、“普遍价值”之类的话语对全球化进行阐释，异常简单地视西方或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为人类的终极价值，以所谓共有文明的浪漫表述掩盖全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将全球化陌生化了，认为中国距现代化还十分遥远，中国还有巨大的封建因素，根本谈不上全球化，因此全球化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简单认为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仅仅在中国本地发生，甚至否定全球化的存在，或者认为在中国自身的问题如此复杂之时，谈论全球化是一种“奢侈”，用一种刻板的所谓“民粹”关切抗拒全球化。对于全球化的“浪漫化”论者来说，全球资本主义仿佛是我们的唯一前途，福山式的资本主义胜利变成了一种公理，亚洲金融风暴在这种视角下，变成了美国和西方胜利和优越的标志。全球化被想像成为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最好方案，它似乎意味着一种“世界大同”梦想的实现，一种人类的普遍的自由。像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泰坦尼克》这样全球流行的电影仿佛都是这种“大同”的例证。而“陌生化”论者则害怕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对于自己生活的冲击，竭力用抽象的“大话”掩盖现实的挑战。这两种看法都无法理解全球化的当下“状态”。

我以为,思考全球化的关键是破除对全球化的浪漫的、一厢情愿的理解以及将全球化陌生化的倾向。正是这种理解和倾向使我们尚未脱离一种冷战时代的思想封闭症。全球化无疑带来了无限的发展可能和未来机遇,它显然促进了人类的经济和文化民主,显示了人类生活的活力。但亚洲金融风暴和最近的俄罗斯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及全球市场的持续混乱都说明全球化既不是浪漫的梦想,也不是遥远的天外事物,而是在我们身边的具体存在。它实际上意味着世界资源和财富的不断的再分配。也意味着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国际性不平等。它既提供了巨大的期待和发展的可能,也存在巨大的危险。它带来的变化往往是我们无法把握的。

人们开始发现全球化的巨大危险是现实的。连全球资本主义的代表、金融大亨索罗斯在他的新著《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一书中,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也提出了极为悲观的看法。他指出继亚洲诸国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经济恶化、巴西则濒临危机边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黔驴技穷,已无力挽救失控的局面。他甚至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行将瓦解(《联合早报》1999年1月24日)。索罗斯的见解无疑说明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安已经极其广泛。从90年代初以来,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乐观情绪一直主导着舆论。冷战的结束似乎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提供了论据,不受干预的市场和不受制约的自由竞争成了新的信条。但今天在全球市场上出现的问题不得不使人再次面对资本主义的局限和困境。人们发现一种对于全球化的冷静分析的必要性。正如殷惠敏所指出的:“全球化的神经中枢是在北美、欧洲、日本这些相互联系的经济体,可是风暴一来,受打击最大的却是经济结构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只有少数国家缩小了同‘北方’的差距。可是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个差距是扩大了。全球化对一国内部的影响。根据一些社会调查似乎也是扩大了贫富差距。这显然不是一



索 罗 斯

场公平的游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梦魇》《中国时报》1998年9月10日）

毫无疑问，全球化对于文化的冲击也非常严重。我们不能仅仅认同于全球化，而是应该看到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者不是我们，全球化的规则也不是我们制定的。加入这个进程是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我们的加入必须冷静而清醒，保持一种批判性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批判性会使得我们不再陶醉于幻想之中。不能简单地将普遍性作为绝对的价值，因为那种所谓的普遍性无非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遁词而已。其次，我们也不能以批判全球化中的问题来掩盖我们自身的文化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也不可能由于全球化而简单地被一遮了之。一句话，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对全球化的“问题意识”，将全球化“问题化”，在多重批判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三

全球化的文化后果在日前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球化加快了个人与世界的联系。个人开始不需要任何中间群体就可以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跨国资本在世界各地寻找人力资源，在无限扩张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许多人依靠全球市场的种种机会暴富。知识经济及高科技更给了知识生产者更多的机会进入全球市场，获得无限的选择性。这样，文化的差异性和弱势群体的文化选择就必然会受到冲击。国际性的“白领”阶层开始在跨国经验之中沉醉。这些处于全球化“前端”的人们脱离了自己的社群，变成了全球化冲击下的无根的浮萍，飘荡在网络和洲际旅行之中。正如一部名为《谈情说爱》的影片编剧张献所直截了当指出的：他们制作这部电影的愿望是“跨越华语或称为母语文化的局限，而成为一种国际的、世界背景的共同文化的主人”（《电影新作》1996年第2期第39页）。这个“主人”的说法显示了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权力结构。这种跨国公民可以超越自身的认同、同时在本地经济困难时不受影响，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分配中获得利益。他们成了全球化创造的新的“精英”，他们从全球化之中得到了想像的东西。往日的“私”的方面目前

已经由于全球化而发展了自身，变成了所谓“国际接轨”的新的可能性，传统的公共性面临瓦解。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中，国际化的想像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冲击了传统的区域文化和经济。中国目前面对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社会分层、下岗待业、腐败现象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传统的社群面临严重的挑战，我们的邻里关系、社会结构、单位体制都受到冲击。特别是经济面临转型，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经济状况的影响，持续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已无法保持其势头。我们二十年来以经济增长及日常生活改善为基础创造的社会共识受到了冲击。这使得我们难以承受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矛盾，不同的利益和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也会产生许多问题。全球化也冲击了社会，将一些人抛到了历史之外，生活直接面临困难。这深刻地损害了社群的活力，也使得公共生活面对严重的威胁。赛曼·杜林指出：“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和传统。”（《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这种状况已经在中国出现了。社群的“共同文化”已经越来越难于保持其形态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可能被全球化所加剧。这将带来严重的文化挑战。

如何勇敢地回应这样的挑战是当下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中国“后新时期”的文学想像提供了有趣的解决方案。

池莉的小说《致无尽岁月》是一个有关全球化的空间想像的小说，是一部重新画出当下的地图的小说。叙事者“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大毛是一个放弃了认同的人，他不断地漂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似乎是阿卜杜拉的“非领地化”的典型，而“我”则依然生活在故乡武汉。他们的差异正是全球化冲击的结果。“我”医院的通信地址十几年如一日地没有变化。大毛的明信片从人类居住的这个辽阔地球的四面八方越过万水千山朝着这固定的一点飞来，就像候鸟。……明信片来自云南、西藏、上海、新加坡、德国、泰国、美国，还有一张是非洲的喀麦隆。……大毛去的地方都是人们想去旅行的

地方，都是好地方。我不知道他是去旅行还是去工作，可是无论他去干什么，我都毫不怀疑那是出于他生命的需要。”但“我”的选择完全不同，“我”尽管有外国的学位，却坚持认为自己生活着的武汉是自己的认同所在。这篇小说关于武汉这座中国内地城市的描写是其最迷人的段落：

“我不是一个人在武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我的周围，我还有一层层的基础。它们是我的工作，多年的出色的工作，以及外界对我的信任和赞赏。那是在某次会诊会上有力的发言，那是遇到紧急抢救的时候院长在广播里对我急切的呼叫。……我治疗过许多病人，他们经常在大街上认出我并感激地与我打招呼。在有香花的日子里，在我上班的途中，总有熟人把最新鲜的白兰花、茉莉花和梔子花塞进我手包。还有黄凯旋这样一群朋友。他们和我谈不了多少话，但是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喜欢找你，你碰上了困难也可以找他。如果他正在吃饭，他放下饭碗就会跟你走。黄凯旋死了，在不该死去的壮年。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实在让你不忍轻易离他而去。一旦有朋友长眠在哪块土地上，你对这块土地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大毛将全球化视为他唯一的追求，而“我”则将它视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里，池莉珍重的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对于社群的认同和对于自身生活价值的感情。她无疑认为，无论全球化产生了多么巨大的离心力，一种来自社群的依恋仍然存在。池莉表达的是一种期望和感情，这种感情是在全球化时代处于它的“前端”、获得种种机会的人应该具有的价值观和认同感。“我”显然不属于社会的底层，也有无数机会，但社群的价值仍然凸现了出来。只有在社群之中，个人才有价值。池莉没有简单否定全球化，但她希望其成果为社群中的人民共享，大毛的空虚和“我”的充实之间的对照无疑显示了一种可能性在本地生成，也凸现了全球化乃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神话。《致无尽岁月》提供的是一条既不简单肯定全球化，而又要寻求它与本土生活的联系的途径。她写出了来自得到全球化益处的人们的新的选择。这种

选择不是随波逐流，完全认同于全球资本主义，而是将全球化置于与本土人民的选择一致的方向上。

与此同时，从1996年开始，出现了一股“社群文学”的潮流，它以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为代表，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社群文学”从“基层”回应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挑战，提供了对于“发展”的不同方面的深入反思。它以在中国基层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后果为探索的对象，在面对种种矛盾和问题时，它并不悲观和失望，而是提供了来自社群认同的选择。在这里，过去的生产单位已经被一种社群的纽带所替代，人们开始发现在昔日的共同性之中的新的可能性，变革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一种同舟一命，分享艰难的共同参与和共同认知。这些作品并不迎合全球化，也不消极对抗，拒绝全球化，而是在批判中期待全球化为全体人民所分享和参与。它拒绝对于全球化的“浪漫化”和“陌生化”，它以前所未有的感性力量表现了全球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意义。但它却是以社会公正和社群

利益为基础去提供见证。它试图在当下建构

一种新的“公共性”。它拒绝那种“个人”力争上游的丛林价值，而是坚持社群的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共同价值。可以说，我们的确看到了在全球化过程中来自中国“基层”的声音，我们看到一种民间的社会主义的特殊的活力。

我想，在面对全球化这样一股潮流时，池莉和“社群文学”殊途同归，他们将全球化“问题化”了。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有启发性的。他们都提供了一种新的辩证



的智慧和一种承担的伦理。全球化不应该是公正和不平等，而恰恰应该是为自己的社群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全球化不是一个普世的福音，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全球化也不是“历史的终结”的乌托邦，而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问题”。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抗拒，也不能简单地认同。在批判和反思中探索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虽然这种批判和反思面对着巨大的困难。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前途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明智和敏锐。

但问题终究还是存在：全球化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上接 68 页）

想像的要强大得多，它依靠美元、战斧式导弹和以美元作支撑的消费主义文化来建立自己的强权。美国正在成为“资本”这一现代暴君身边的宠臣，其国家战略就是要能够借用资本的力量为所欲为。

或许有人问，何以从科索沃事件中对西方文化的整体作如此推断，这样做是否过于武断？答曰：可以从政治现象联想到文化，以对西方民主制度一贯所有的认识，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西方政治家之所为正是民意的体现。在专制主义国家，其所作所为不过体现了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那么，在民主国内，政治家的行为当然应出自于国民意志。正如托克维尔所

说，民主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今天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的质素狂泻，难道不正反映出其民族精神的普遍状况吗？

今日的西方，伟大的政治传统已逝。这已不再是诞生了拜伦、考德威尔这样一些伟大的自由主义战士的西方。民主政治需要道德为其本，政治自由的目的是正义，没有道德的民主和没有正义的自由，必将导致政治之无耻化。因此，资本主义与正义的政治势成冰炭水火，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道德与正义之根基——文化。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政系法学博士）

全球化进程中的 国家主权原则

..... 桑玉成

越来越多的跨国界行动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这里有美、英攻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那里有北约干预科索沃危机的巴黎和谈及其对南斯拉夫的野蛮轰炸；这里是土耳其越出国界抓到了厄贾兰，那里是席卷众多国家的金融危机……。如此繁复的国际交流和渗透，客观上使得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地位受到了动摇。一方面，一些国家以主权原则为武器，反对其他国家以及国家间组织对其国内事务进行干涉；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则以超国家的利益为理由，大挥所谓“新干涉主义”的大棒。

毫无疑问，当代纷繁复杂的国际态势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提出了挑战。

从国际政治或国际法的角度视之，国

家之所以构成国际行为主体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国家具有独立的主权。自从16世纪著名思想家布丹阐述了他的主权理论之后，人们普遍接受了国家具有独立主权的思想，并认为主权和领土、人民一起，构成了国家的基本要素。

传统的主权理论认为，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国家范围内的任何部分、任何人或事物，都在这个权力的管辖之下。这个被称为主权的東西，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第一是它的最高性，即在一定国家范围内，主权是最高权力从而也是最终的权力；第二是它的排他性，即一国的主权不受任何别国或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的干涉；第三是它的不可分割性，即指任何别国、国家联

盟或其他非国家机构均无法从一国主权中分享任何部分的权力。主权理论为国家主权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至今仍然成为一些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武器，仍然是国家间交往的基本指导思想。

但是，当代国际社会全球化趋向的日益突出给国家主权原则注入了新的内容。首先，领土或说地域的概念一向是与国家相联系的，恩格斯在谈到国家区别于氏族其特征时，就指出国家是以地域来划分它的居民的。地域是受到了国界的限制的，但一国的资本却得以穿越峡谷，飞过海洋，走向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工业和贸易的“跨国界行动”以及交通、通讯的现代化，使我们这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小，越来越无法分割，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闭关独处，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尽管各国对当今的国际事务还无法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但谁也无法不顾及国际环境来作出自己的行为。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国家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依赖的。强调它的独立性而忽视它的相互依

赖性，或强调它的相互依赖性而放弃它的独立“人格”，对于理解当今的国家间关系都是毫无意义的。

毫无疑问，今天人们依然在强调国家主权原则，认为尊重国家主权是国际交往的首要原则，甚至《联合国宪章》也明确规定，联合国不干涉原则上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但是，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利益关系变得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在国家间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协商、妥协以求同存异。尤其是在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内，它对某一地区性事务或世界性事务作出决议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对某些特定国家主权的“干涉”。尽管这些特定国家承认联合国的决议，履行它对于联合国的义务，但是这种承认决议和履行义务本身就表明了主权的一种让与。

分析起来，全球化进程给国家主权观念和主权原则带来了如下一些新的问题：

第一，主权与非主权的界限有模糊的趋向。在过去，所谓主权领域的事务